

毛泽东与图书资料工作

——根据革命战争年代资料整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对我党的图书资料工作十分重视。他对建立图书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做过重要的指示，对加强图书资料的收集和管理采取过有力的措施，使革命根据地的图书资料工作得到一定的发展，保证了我党学习理论，开展调查研究和进行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的言论和活动，对于当前图书资料工作的建设仍有指导意义。现将我们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加以简要介绍，供图书馆工作者和资料工作者研究参考。

(一)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工作。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过：“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①毛泽东同志除了强调进行社会调查外，还提倡通过收集图书报刊，详尽占有材料，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就在自己的身边建立了资料工作。他请贺子珍同志阅读和整理从敌人手里搜集的大量报纸，按照他所做的各种记号，分成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动态、人民动向等各种门类，剪贴成册，供随时查用。^②那时，情报来源比较困难。毛泽东同志除了听取红军和群众的汇报外，还通过报刊的渠道了解国际国内的情况，制定作战部署和各项政策。他曾给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写信收集书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汀州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惟党



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在这封信里，同时还附给李立三同志一封信，说：“我智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③一九二九年，傅连璋同志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汀州订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东的《工商日报》、《超然报》，派人定期送给毛泽东同志，受到他的称赞^④。

那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是很严密的。不仅不让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进入苏区，即使白区的报纸也不例外。据贺子珍同志的回忆，那时为了弄到书报，毛泽东同志曾经派了几个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到附近城镇跟小商人联系，请他们代订一些书报。结果花了很多钱，只能拿到很少一点旧书报。因此，在迫切需要了解敌情时，不得不用军事手段到敌占区“抢”资料。一九二九年初，当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急需判明尾追敌人和瑞金城内敌人的动向，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于是，在武阳决定派宋裕和同志带一个连到瑞金县城弄报纸。结果弄到了一些《国民日报》、《中央日报》和上海、广东、福建、江西的地方报纸。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地说：“抢来这么多报纸，收获不小哇！”毛泽东同志从这些报纸的字里行间，进一步印证了关于敌人的实力、动向和企图的情报，就同朱德、陈毅同志商量，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攻打尾追之敌刘士毅部。著名的大柏地之战，就是这样打响并取得胜利的^⑤。

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继续通过白区的报纸收集情报，了解形势，确定红军的行止。当时，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已经确定，但落脚点尚未选定。根据聂荣臻、彭德怀、杨成武等同志回忆，红军原准备在川、陕、甘开辟根据地，出了腊子口，在哈达铺获得敌人的报纸，知道陕北根据地的情况，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认为中央红军到陕北根据地更加有利，才决定向陕北进发^⑥。

经过长征，中央积累的图书资料损失很大。中央到达陕北以后，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大量地不断地补充图书和报刊。虽然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有所放松，但是通过正常渠道购买图书资料仍然是很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亲自开辟各种渠道。

毛泽东同志曾请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通过合法手段订购大量图书报刊。他先后多次给在重庆从事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发电报，请他们为边区的党中央机关和学校订购报刊资料。为了提高学校学员和部队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电告叶剑英、刘鼎同志，请他们购买一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籍，强调要“选择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等，每种买五十部，请叶剑英同志经手选择，刘鼎同志经手购买。^⑦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任弼时等同志电告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请他们暂订全国各地日报两份，购买各种书籍刊物，“不论普通的专门的”，各买三份。并指定将这些刊物寄新华书店转胡乔木同志或者李富春、王首道同志收。电报说：“此间收到后统筹分配；其他需要的特别书籍，均由书记处办公厅电告，以兹统一，经费请各筹拨支付，每年即（使）超过一百元亦

所不惜”。*

为了向全国购买书刊，毛泽东同志请一些同志向南京、北京的书店，如商务、中华等书局以及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等，购买各种书籍杂志和地图。为了防止在寄送中被敌人扣留，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同志电告董必武同志：“所购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书籍，请办交涉，是否可先运来。左翼书可暂不运，以免被阻”。*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通过东北军获得了一些图书资料。他曾向张学良将军借过书籍和地图。一九三六年三月，在同东北军王以哲商谈停战协定时，王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了两批物资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一起赠送给红军。^⑧由于彭德怀同志的工作，东北军高福源曾用飞机给红军投下大批报纸刊物。^⑨

此外，毛泽东同志注意利用敌人的资料，来宣传我党我军。一九四四年六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考察，为了向记者介绍我军英勇作战的情况，粉碎国民党诬蔑我军的阴谋，毛泽东同志曾致电各中央局、各军区和各区党委，“望各局各委及各军事机关立即动员搜集大批敌伪出版的关于称赞我党我军勇敢、巧妙，畏惧我军实力及其种种对策之言论及统计数字，用新闻密码火速发来。要有书报名称、出版年月日及作者姓名。”并指出：“望当作一件大事办理”。*

通过上述各条渠道，延安地区中央各机关单位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图书资料的补充，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需要。

(二)

从现在接触到的材料看，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要求从各地收集的图书资料，不仅数量大，而且内容广泛。他主张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材料、观点进步的和观点反动的材料，都要广泛收集，使其为我所用。这一时期，重点收集的图书资料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一九三二年红军攻打漳州时，他弄到一本上海出版的《反杜林论》译本，如获至宝。长征途中，他扔掉了一些衣物，但是马列主义的重要书籍一直带在身边。^⑩到延安以后，他除了大量收集马列著作的各种译本，还特别强调大量翻译马列著作和外国古典名著。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他写信给凯丰同志提出：“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又写信给凯丰同志，说：“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⑪

毛泽东同志还广泛收集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写作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九三七年五月，李达同志著的《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曾寄给毛泽东同志一本。他读后很高兴，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请其他同志、朋友购买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书籍。一九四

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给胡乔木同志说：“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信中还提出：“听说有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大家知道，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发愤攻读古今中外的哲学书，特别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收存的毛泽东同志阅批过的书籍，相当大一部分是他在延安时期读过的哲学书籍。他从这些书籍中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养料，写下了光辉的哲学著作。^②

二、军事、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资料。为了研究军事问题和指挥战争，毛泽东同志曾要求大量收集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和地图。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通知刘鼎同志，请他购买军事书籍及地图，要求买战略学书和中国古时兵法书，不买普通战术书。他还曾请其他同志在白区替他购买《孙子兵法》。* 为了抗击向华北进犯的日军。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曾要彭雪枫同志“立即派人送地图来，要十万分（之）一者，选送北平、石家庄、太原、百灵庙、张家口五点之间的图，特别要五台为中心的二十余县，无图不能指挥作战”。* 为了配合红军大学的教学工作，毛泽东同志要王稼祥同志为红军大学搜集战略教本。他还给何干之同志写信，提出要“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

为了研究经济问题，毛泽东同志曾请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大量收集各种有关中国经济的书刊资料。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关于订购书报问题给董必武同志的电报说：“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同志，急切需要下列各书报：“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列强军事实力》、《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以及该所出版的各期《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等。”*

毛泽东同志还要求收集历史方面的书籍。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他致电李克农同志，请他购买中国各朝历史演义两部。* 一九四二年中央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缺少《汪陈联合宣言》、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争论问题》以及《五次大会决议》等文件，毛泽东、任弼时同志曾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请他们“用一切方法找到”，邮寄或送到延安。*

有关国际问题的书籍毛泽东同志也注意收集。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任弼时同志致电周恩来同志，请他在重庆指定专人负责搜集中外各地出版的关于国际问题的各种书籍。*

三、各种报纸杂志。毛泽东同志历来很重视报刊资料的收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要求尽可能把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收集齐全。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同志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请他们代订《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等及云南的各种报纸。*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任弼时同志致电周恩来同志，请他为中央机关订购大批书报杂志。要求各种报纸，除为中央调查研究局、军委、中央书记处、前总、青委、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中财部、中央办公厅、西北局、边区政府和马列研究院等各订一全份外，还要给延大、鲁艺、科学院等单位选订《大

公报》二三份。各种杂志，除为研究局订一全份外，还要选择有实际材料的，如《时与潮》文摘等，以及同中央各部委和学校的工作性质有关的刊物，订购十余份。

此外，毛泽东同志对于各种统计、提要、年鉴、书目、索引等工具书的收集也是很重视的。

(三)

在战争条件下，图书资料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获得的，十分宝贵。毛泽东同志对管好用好图书资料是非常关心的。为了充分发挥图书资料的作用，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关怀下，陕北根据地曾先后组织流通图书馆和中央研究局图书馆。

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后的红军，面临抗日高潮即将到来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精神食粮。但当时中央掌握的图书资料很少，难以满足要求。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李富春同志致电中央，提出前方干部渴望书报，建议建立流通图书馆。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同志次日复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同志：“（一）同意富春同志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②这是一篇我党保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图书馆工作的珍贵历史文献。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央机构实行精简时，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成立中央研究局的决定。规定在研究局之下，合并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图书材料室和文抗、财政经济部的图书馆，成立一个比较完备的图书馆，专供研究机关及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之用。并要求规定管理图书及借阅的严格制度，保障图书不致失散。同时还决定成立材料室，下分政治、经济、国际三个组。材料室的任务是，整理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等时事问题的材料，提供政治局各同志作为了解情况，研究问题的参考。

毛泽东同志十分爱惜图书，支持图书馆的工作。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图书馆的工作制度。他多次派人到马列学院图书馆借书，总是认真登记，按期归还。当他发现有的同志不慎将书籍遗失时，就提出严厉批评。一九四七年三月党中央暂时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嘱咐身边的同志将重要的书籍收藏好。此外，他曾把自己的一些藏书赠给马列学院图书馆和中央图书材料室，充实它们的藏书。他还曾先后为筹建边区医院图书馆、鲁迅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捐款。^③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关怀，根据地的图书馆事业和情报资料工作到得很大发展。仅延安地区，就先后建立了中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中央图书馆、马列学院图书馆等一批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和资料工作机构。延安市区还成立了图书馆协会。这些图书馆在革命战争年代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金竞铭 李惠斌 唐见林）

附 注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49页。

② 袁之倬、郭晨：《贺子珍与报纸》，《新闻战线》，

1980年第1期。

③ 龚育之：《〈实践论〉和党的理论建设工作》，《文

献和研究》，1982年第7期。

④ 傅连璋：《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76页。

⑤ 见注②。

⑥ 聂荣臻：《忆长征》序，《忆长征》第1页；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05页；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社，1982年出版，第226页。

⑦ 见注③。

⑧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26页。

⑨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09页。

⑩ 吴黎平：《〈反杜林论〉中译本五十年》，《文汇报》，1982年5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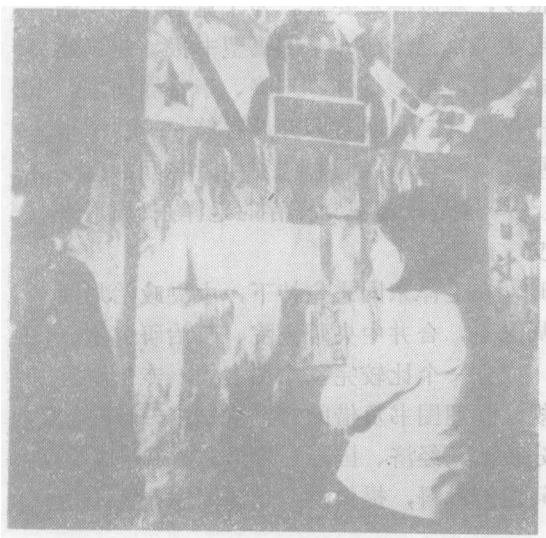
⑪ 见注③。

⑫ 见注③。

⑬ 见注③。

⑭ 林述：《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地区的图书馆事业概况》，《图书馆学通讯》，1959年第5期。

●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电报。



◀墙报在苏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我在北大当着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1938年版



▲红色图书馆阅览室